



师大学志

王 跃 王炳林 齐卫平 丁俊萍 丁晓强 著

张静如 学术思想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师大学志

张静如学术 思想研究

王 跃 王炳林 丁晓强 著
齐卫平 丁俊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静如学术思想研究 / 王跃等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师大学志)

ISBN 978-7-303-15800-3

I. ①张… II. ①王… III. ①张静如—学术思想—研究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4846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ZHANGJINGRU XUESHU SIXIANG YANJI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60 mm × 230 mm

印张: 28

字数: 445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0.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曾忆梦 刘松弢

美术编辑: 谭徐锋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 言

—

张静如先生从教60年来，除一次使用笔名“蔡韦”外，一直用“张静如”、“静如”的真名，没有使用过其他笔名、别名，同时既无“字”，也无“号”。

张静如先生生于1933年1月3日（农历壬申年腊月初八），汉族，北京人。父亲张紫垣解放前在北京市电车公司工作，由工人到课长（解放前不用科）；母亲陈蕴清，家庭妇女。家中有姐姐、弟弟、妹妹，共兄弟姐妹四人。解放前生活在一个电车公司职员家庭，生活水平中等偏上。

1938年9月，5岁半的张静如入私立箴宜小学（现已无）。1944年9月，11岁半时上私立大同中学（现北京二十四中前身）。在读中学期间，从初一到高一上学期爱好打球，经常旷课、除了爱好历史书，不爱念一般教科书。后在小学好友魏华聪（已去世）规劝下，从高一暑期开始发愤读书，到高三时成绩已是全班前三名。

张静如先生中学期间喜欢读史，到初三时已经读过二十四史；中学毕业前还读过陈垣、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的历史著作和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因为崇拜史学家陈垣，决定中学毕业后报考辅仁大学，当陈垣的学生。1950年9月他终于如愿考上辅仁大学历史系，成为陈垣的末代弟子。在新中国诞生前后形势的影响下，他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50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张静如先生考上辅仁大学历史系本科后，在学习上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个性，有些课程经常旷课，把时间用于泡图书馆和研究问题，造成了有些课程常不及格，有些课程成绩特别突出。从大学二年级起张静如先生热衷研究太平天国，被同学戏称为“太平天国专家”。1952年9月辅仁

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积极要求入党。1953年2月大学三年级时，因图书资料方面的特殊爱好和才能，提前留校工作，在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教研室资料室担任资料员。1953年7月张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2月学校派他去北京大学哲学系随苏联专家学习（此段学习经历后被确认为“研究生”学历）。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写出《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毕业论文（该论文于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学习结束时，冯友兰先生曾找他谈话，希望他留在北京大学搞哲学，出于对北师大的感情，他没有同意，1956年7月回到北师大。

张静如先生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后，从事了一年马列教研室哲学公共课教学，并担任教研室党支部组织委员，后转到马列教研室党史教研室从事党史专业课教学与研究。这期间张静如先生经历了“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但均未受波及。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笔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因是集体写作，署名蔡韦），这是国内较早研究五四时期三次论战的专著。1960年被北京市抽调参加编写党史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被以“黑帮”名义“揪出”，受到冲击。不久“解放”，成了“自由人”，烧过锅炉，下放过农村。“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便参与北京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本子主编工作，后因中宣部决定收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未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静如先生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1979年被评为副教授，1983年被评为教授。1982年开始培养硕士生，1987年开始培养博士生。到2012年张静如先生已经培养硕士生32人，博士生56人，博士后8人，高级访问学者41人。

张静如先生1956年与关崇峻女士结婚，至今已过金婚之年，育有二女。2013年初是张静如先生80寿诞和从教60周年。他与夫人虽年老多病，但生活尚能自理，且思维敏捷。

二

张静如先生是我国当代中共党史教学、研究和社会活动的大家。张

静如先生自 1953 年 3 月参加工作从教 60 年来，先后发表了 300 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合著、主编著作和工具书等 60 多部（册），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学术观点，是中共党史研究一座丰厚的思想宝库。从学术上深入挖掘、系统梳理和研究张静如先生的中共党史思想，对于推进中共党史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2003 年张静如先生从教 50 周年和 70 寿诞时，我们曾编辑出版了《张静如学术与教育思想研究》一书。该书虽然对张静如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了初步梳理和研究，但系统性、学术性、思想性尚不够，没有对张静如先生中共党史思想的学术价值进行充分挖掘和研究。值张静如先生从教 60 周年和 80 寿诞之际，从学术上对张静如先生的中共党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反思和总结，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出发点。

要想完整、系统地反映张静如先生的中共党史学术思想，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一则因为张静如先生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研究和学术活动时间长。张静如先生 60 年学术生涯中的许多学术思想除了体现在公开发表、出版的学术成果上，还大量体现在教学过程和参加学术活动中。特别是在 60 年教学过程和大量学术活动中提出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很难完全挖掘出来；二则因为张静如先生的学术思想丰富。在 60 年的学术生涯中，张静如先生前后提出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多达几十个。这些学术思想、观点几乎涉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大到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学科体系、基本原则，小到中共党史具体人物、事件、过程的详细考证。层次不同、观点众多、内容丰富，很难进行系统、完整的梳理；三则因为张静如先生的中共党史研究常常是跨学科的。张静如先生把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有机融合，形成张静如先生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也为按一般中共党史思路梳理张静如先生中共党史思想增加了难度。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设计该书框架结构时，没有按照一般思想史、以时间顺序为主的写作思路，而是从“中共党史若干时期及人物研究”、“中共党史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思想研究”、“中共党史学基础理论研究”五个方面对张静如先生的中共党史思想展开研究，突出张静如先生对中共党

史研究中的重点问题、重大问题、基本方法的思想创新和观点创新。各位读者要想了解张静如先生的学术思想史，可以参见本书的“附录”。

与一般性的纪念文集不同，本书作为党史界第一部系统梳理和研究张静如中共党史思想的学术专著，在动笔之初，我们就确立了以下三条编写原则：第一，力图对张静如先生中共党史五个方面思想做出系统梳理和总结。张静如先生60年来，开拓了中共党史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学术命题和新思想、新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张静如先生创新性的学术思想，是编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第二，客观评价张静如先生的学术成就，包括进行学术商榷与批评。张静如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共党史的学术探索和创新，我们作为后生学子，不仅要深入系统、全面地反映张静如先生的学术成就，更要对张静如先生的学术成果做出客观评价，站在学术发展和新的时代高度，指出张静如先生学术思想进一步发展和探索的空间；第三，体现传承与创新，力求全面反映张静如先生学术思想对中共党史学的推动作用。张静如先生开拓了许多学术研究领域，提出一系列崭新的学术命题，在中共党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党史学界在张静如先生的学术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客观反映在张静如先生学术思想影响下的党史学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也是编写本书的重要目的。

统稿过程中，针对撰写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再次强调了以下编写意见：在正文中对张静如先生不用夸张、溢美之词，而是要通过具体论述和观点来体现张静如先生的学术贡献与成就；在论述张静如先生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与学术成就时，要充分注意到张静如先生学术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和针对性、学术思想的传承性和评价的客观性，包括指出张静如先生学术观点中存在的不足。我们认为，越是客观研究和评析，越能反映张静如先生学术思想的价值，越能提升本书的学术价值。

除上面介绍的本书编写的缘由、方法和原则外，还有必要向读者就以下几个问题作进一步说明。

其一，本书中涉及的一些概念、术语的使用问题。

张静如先生在60年中共党史教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中共党史方面的新概念和术语。如“中共历史”、“中共党史学

基础理论”、“中共党史史学理论”、“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史料学、目录学、文献学”、“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中共历史大众化”、“中共历史群体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中共党史”、“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化与中共党史”等等。为了尊重事实，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律使用张静如先生原来的概念、术语，并尽可能从学术上对张静如先生的这些概念和术语进行诠释与界定。在2004年前，张静如先生按照学术界惯例，把中国共产党历史表述为“中共党史”，2004年后，张静如先生则把中国共产党历史表述为“中共历史”。为了尽量体现这一历史真实，在本书中这两个概念根据需要同时出现。考虑到在张静如先生60年学术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使用“中共党史”概念，所以本书各章节标题、内容表述上大部分使用“中共党史”概念。

其二，关于本书风格和内容重复问题。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由编者统一设计框架结构、确立编写原则，以命题作文的形式，约请20多位熟悉张静如先生学术思想，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分别撰写。虽然全书在体例上是统一的，但难免出现写作风格上的差异。这种风格上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正是体现了本书各位作者学术上的独立思考。

造成内容重复的原因，一方面是张静如先生的许多学术思想本身难以分割，存在内容交叉和重复。如：第四章中第一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历史研究”，第二节“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第三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第四节“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内容重复；另一方面各位作者是独立完成自己部分的撰写，写作时间短，无法及时与其他作者沟通，也可能造成内容交叉、重复；虽然我们在统稿过程中已经尽力把内容交叉、重复的地方加以修正，但在本书中还是有不少地方存在内容交叉、重复问题，请读者谅解。

其三，关于本书的注释和引文问题。

关于本书的注释和引文问题，为了体现学术上的严谨性，我们做了如下规定：首先，引用张静如先生公开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述中的文字均注明原出处，不注《张静如自选集》、《静如文存》或《张静如文集》；其次，引用张静如先生没有在公开刊物、出版社发表、出版的文

字，但收录在《张静如自选集》、《静如文存》或《张静如文集》中的一些讲话、序、讲稿、评文纪事、昔文今评等，统一引用《张静如自选集》、《静如文存》或《张静如文集》。例如：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评文纪事）》，见《张静如文集》第2卷。

编写一部《张静如学术思想研究》，是我们多年的想法，经过20多位作者一年多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我们深知，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张静如学术思想研究》，远远不能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张静如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上也远远达不到张静如先生中共党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可能会让喜爱、熟悉张静如先生的专家、学者失望。我们热切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执笔：王跃）

目 录

第一章 中共党史若干时期及人物研究	1
第一节 五四时期研究	1
第二节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研究	16
第三节 社会主义时期研究	31
第四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	41
第五节 李大钊研究	63
第六节 陈独秀研究	88
第七节 刘少奇研究	104
第八节 中共其他历史人物研究	115
第二章 中共党史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129
第一节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中共党史研究	129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与中共党史研究	161
第三节 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	173
第三章 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192
第一节 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基本思想	192
第二节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	210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	221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社会与社会主义革命	240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思想研究	25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历史研究	259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281
第三节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	296
第四节	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	318
第五节	中共历史大众化	337
第五章	中共党史学基础理论研究	354
第一节	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	354
第二节	中共党史学史料学	364
第三节	中共党史目录学、文献学	368
第四节	中共党史学史	381
附录一：	张静如著述目录	409
附录二：	研究张静如文章目录	431
附录三：	主持全国党史学位点会议情况	433
后 记	437

第一章 中共党史若干时期及人物研究

第一节 五四时期研究

张静如先生在《静如文存》自序中写道：他1953年20岁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资料室当资料员时，曾有“整整十个月的时间……住在资料室，从早到晚和这些资料泡在一起，像《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期刊，都通看过一遍”；后来，为写《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几百种期刊”。^① 这些工作，为他日后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特别是五四运动研究打下基础。张静如先生对五四运动研究，倾心颇多，成果显著。他的研究涉及五四时期的人物、刊物、五四运动的历史定位、创新特色、马克思主义接受与传播、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到见解的观点，对国内学术界有很广泛的影响。

一、五四时期人物

五四运动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中较早展开研究的领域，在五四运动发生之时即有研究或评论文字，但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完整地研究五四运动中的人物，却始自20世纪50年代。张静如先生1957年出版的《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是最早研究李大钊思想的著作，后又有《陈独秀评传》等文字出版，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初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著作出版，使张静如先生较早对五四时期的进步人物有了较为整体并深入的观察，从而

^① 张静如：《静如文存》上卷，自序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即发起或加入有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研讨中。当时人们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五四运动时期……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概念理解不一。张静如先生强调：“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他们所能达到的水平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有初步了解，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赞成俄国十月革命，主张暴力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努力为此而奋斗”，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走俄国人的路”的境界。同时指出，与成熟时期比较，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然存在不足：其一，“他们的世界观上保留着若干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东西”，“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民主主义作解释；论述唯物主义，却夹杂着唯心主义。特别是当他们分析中国现时政治斗争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并存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其二，他们中除毛泽东等少数人外，多数人“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但他们仍做出重大贡献：“第一，宣传了十月革命，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个大解放”；“第二，领导和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胜利发展，使它成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第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张静如先生后来在“评文纪事”中指出，这些观点发表后，在党史学界起了点解放思想的作用，也引起一些争论，有人认为标准高了。但他至今仍不同意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说成与马克思主义不沾边，且还须明确，尽管有人快一点，有人慢一点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但就整体上说，到中共成立时他们才完成了这种转变。明确这两点，再谈标准，才能说到一块。否则，只能各说各的。^①

20世纪90年代以后，张静如先生又进一步探讨五四精英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指出：其一，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与五四精英的文化价值意识相符。通过分析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与蔡元培、李大

^① 张静如：《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4）。

钊、陈独秀的文化思想，先生认为“虽然五四精英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认识到单纯靠文化的变革并不能救国的道理，但他们在当时将文化视为改造中国舍此无他的利器，则显示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对先进文化的需要”。其二，五四精英与五四时期的文化斗争推进了文化的革新发展。五四精英们展开的文化斗争从大的方面说有三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头一炮”，“对孔教和儒家思想的批判”，“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除这三方面外，五四精英在文学体裁、诗歌、绘画等方面也提出了强烈的改革思想，“要把新思想的阳光照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体现出强烈的文化革命意识”。其三，五四精英把握先进文化的历史特征表现在：“第一，立足时代的进化来审视文化的价值意义，树立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观念”；“第二，力求从世界的整体性来思考中国先进文化的重新建构，倡导汲取人类的先进文化”；“第三，努力剔除封建迷信的糟粕，将文化建立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基础之上”；“第四，以能否满足民众的普遍需要作为文化取舍的标准，强调文化的大众性”；“第五，坚持把创新与文化的建构相联系，引导文化朝新的方向拓展”。其四，五四运动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前进方向与先进文化相关联。“五四时期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有两件实质性的事情：一是领导近代中国革命的先进分子的世界观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其成果是形成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二是近代中国的先进组织资产阶级政党被无产阶级政党所取代，其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两件大事都与五四精英和五四先进文化有关。前者表现的是先进文化促使五四精英中一批思想更为敏锐的知识分子率先接受新的世界观，后者表现的是世界观转变后的知识分子将先进文化开始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张静如先生后来在“评文纪事”中说：“本文的缺点是在分析五四精英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时不够全面，其实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没有全盘否定过中国传统文化。”^①张静如先生的这些研究，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贡献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联系起来，具有宽阔的眼界，所作的精到分析和具有的独特视野

^① 张静如、齐卫平：《论五四精英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4）。

给研究者以深刻的启发。

张静如先生对五四时期人物的个体研究主要集中于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等人。由于本书有专章介绍李大钊、陈独秀研究，这里主要介绍对陶孟和政治观和教育观的研究。

关于陶孟和的政治观，张静如先生指出：“第一，他热切追求民主政治的理想，关心中国民主共和政体的建设，对军阀统治极为不满；他谴责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反对强权政治，支持弱小民族，向往世界和平”；“第二，他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倡导人的素质的改造和提高；他关心民众的生活，要求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第三，他的文章特点是分析细致，材料充实，观点鲜明，说服力强，读起来不吃力，这就加强了宣传的效果”，“当然，像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战士们一样，陶孟和对于中国社会没有本质的认识，从而也就不能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方案。不仅如此，比起陈独秀、李大钊，陶孟和的文章显得缺乏战斗力，语言平淡而少激情和鼓动性”。

关于陶孟和的教育观，张静如先生指出：“第一，他热情赞扬和积极宣传现代教育理念，摒弃旧教育制度，站在时代前沿思考问题，毫无保守痕迹。第二，他关心中国的教育改革，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尽力出主意、想办法，一心盼望高等教育出现转机，可谓用心良苦。第三，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因而得出的许多结论，从微观角度来看，都是很有见地的。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提倡。”“当然，陶孟和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良好愿望，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以致后来国民党统治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中国，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人民当家做主之后，教育才能得到正常发展，朝着现代化道路迈进。”^①

这些观点折射出先生的中共历史文化研究学术思想，即研究中共历史中的文化问题，一定要进行个案研究，通过研究文化领域的历史人物，分析评价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贡献，为说明整个文化人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综合作用奠定基础。

^① 张静如、史艺军：《五四时期陶孟和的政治观和教育观》，载《北京党史》，2002（3）。

数年后，张静如先生又对陶孟和思想作了进一步研究，通过分析陶孟和的几句话——“因为失望于现在，就托思于既往，是我们人类常有的心理”；“中国的历史没有一部是描写人民的历史，没有一部是写真社会的历史”；“有生命才可以奋斗，没有生命就不能奋斗。为生命去奋斗，就不应该先把生命断绝”；“人力车之问题不仅为个人或国民经济之问题，实为极重要之社会问题。此种职业乃剥削国民之精力，妨害人民之健康，并且贻害及于后代。此恶不除，全社会之生活被其影响，至于无穷，非过言也”；“我希望学生千万不要忘记了中国的中坚国民，要把新思潮灌输在他们的脑里”——指出：“陶孟和在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是非常积极的，配合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军人物讲了不少有道理并有一定用处，对推动新思想、新文化传播有功，是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这以后，陶孟和虽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走上革命道路，不过他长期从事社会调查工作，也是十分有益的。革命者毕竟是少数人，多数人还是通过自己的职业对社会做出贡献的。”^① 研究中共党史很少有关陶孟和这个人物的。张静如先生提倡研究五四时期的人物既要注重群体的普遍性，也要重视个体的特殊性。关于陶孟和的研究就是体现了他的研究特点。

张静如先生在主持五四知识群体课题研究时曾提出，要对五四知识分子的范 围做“放大”思考，从那时的实际情况讲，凡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人就应当算知识分子了，尤其是不应对“知识分子”的职业有所限制。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该就其学历而言，而不指其做什么工作。不仅学校里的教师、报馆里的编辑、靠译写文章吃饭的人、从事科研或实业的技术管理人员，而且在政界、工界、商界、军界、宗教界……做事的人，凡具备初中以上学历的，都应视为知识分子。从长远的历史看，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后来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里都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顶尖或领军人物。从这个角度观察，可以看出时代、知识和文化素养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研究，也才能看出五四时代的特色和重要性。张静如先生对陶孟和个案的较为深入地研究

① 张静如：《评〈孟和文存〉中的几段语句》，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2）。

体现了这一思想。不过，这种界定知识分子的方式也有混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中特定的群体，以与其他阶层相区别的问题。肯定了知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却容易忽视政界、军界、商界“知识分子”由其经济政治地位和社会生存方式决定的与自由知识分子显著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思想倾向。

二、五四时期期刊

对五四时期期刊进行全面研究始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丁守和等编辑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为代表性成果。张静如先生早年阅读大量五四期刊，特别重视这些刊物对研究社会思想文化及人物的价值，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即对《新潮》有评价：“五四运动前的《新潮》比较好，在反封建专制主义方面有贡献。五四运动后的《新潮》就差劲了，宣传资产阶级学说，不拥护十月革命，不关心现实斗争，总之是向右转了。”半个世纪以后，张静如先生重读《新潮》，又提出 4 点新看法：第一，指出新潮社成员的年龄特点：“1919 年《新潮》创刊时，除像周作人这样的教员在 30 岁以上，其余大部分社员，无论是北大的还是校外的，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这些社员虽然在个性、爱好、志向方面有差异，后来的生活经历也不尽相同，可在当时都具有积极上进，思想活跃，喜好新事，关注国危的青年人的特点”；第二，分析“新潮社”成员的信仰：“五四运动前后，在大量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思想界来的时候，人们信仰什么没人强迫，谁爱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因为引进西方学说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里，能够信仰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已经不错了，比起那些坚持封建专制主义的人要好多了”；第三，分析《新潮》内容，提出三点新看法：一是“旗帜鲜明地反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二是“积极介绍西方的各类新学说”；三是“对世界潮流的看法”，如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两篇文章“对客观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虽然他不赞成俄国十月革命，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第四，张静如先生指出：“《新潮》发表的文章的观点并不都是恰当的。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对人民群众的不正确观点，等等，这也是当时一般